

## 主持人语

近年来，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并推动“美国第一”原则、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的暴发，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欧洲和中欧关系的看法。欧洲一体化将向何处去？欧洲经济将有怎样的前景？欧盟在法律等方面将有什么样的动向？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分歧如何化解？中欧关系、俄欧关系和美欧关系将如何发展？我们亟需对此类问题进行复盘、总结和反思。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家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于2021年10月15日召开主题为“巨变时代的欧洲与中欧关系”的博雅工作坊。

工作坊从政治学、国际关系、法学、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发言涵盖欧洲一体化和民主的困境、欧洲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美欧关系、欧洲国家外交政策、东欧政治转型等议题，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也有微观视角的细节考察，视角多元，论证严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会专家的发言聚焦于欧洲在大变局下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为我国学术共同体勾勒出欧洲研究的轮廓，具有学术引领作用。论坛还提出了“欧洲整合的政治学”概念，有望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工作坊从民族主义、经贸、美欧关系等视角分析了在世界格局变化背景下欧洲的政治心态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政策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巨变时代的欧洲与中欧关系。欧洲对美国依赖减弱、一体化摇摆、政治右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其外交政策可能会向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是制定政策的基石，也有助于避免战略误判。因此，此次工作坊对于研究中国对欧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美欧关系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工作坊既具备学术会议的严谨性和专业性，也兼具一定的通俗性和大众性，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能和较大的公共传播潜力。在新时代外交背景下，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需要积极地“走出去”，担当起大国责任。本次工作坊将时事议题与公共关切紧密联系，积极回应公众对相关知识的诉求，构建公共传播学术化的新话语，推动了我国公共知识界的不断进步。

段德敏

2021年10月25日

## 博雅工作坊第 47 工作间

### 巨变时代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欧洲视角看，是三百年左右未有之大变局。欧洲从中世纪末进入世界舞台，真正崛起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18 世纪产业革命后一跃成为世界近代文明的主导者并向世界范围扩张，建立殖民地，输出文化和制度。欧洲是整个世界现代性的先驱，是今天现代生活和现代秩序最早的构建者。

当前，欧洲面临巨大困难和长期挑战。欧洲的人口在萎缩，而人类的发展尤其是大国的根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口数量。政治上，欧洲经过新教改革后，宗教已经失去政治动员力和政治组织力，由于各国历史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欧洲整体缺乏一种强大的凝聚力。经济上，快速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欧洲采取福利社会主义机制，其前进的活力大大受阻。综合来看，欧洲的困难将会长期存在，欧洲文明还看不出有重新焕发青春的苗头。

从学术上看，研究欧洲对于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具有巨有重大意义。一个伟大的文明经历了 300 年辉煌后再次面对巨大挑战，未来将向何处去。汤因比曾说，文明有生长、发展、衰弱期，但衰弱也可能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回光返照，欧洲能否重新走出来，

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长远问题。我对于欧洲的前途并不悲观，欧洲确实需要伤筋动骨的大改革，但大改革只有面对巨大危机时才能出现。欧洲能否生发出强烈的危机意识，能否激发文明的觉醒，值得仔细研究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的发言题目是《**欧美关系变化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内容主要是 1949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来 70 年间欧美关系的变化及欧美同盟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北约是能够把欧美联系起来的强力纽带。马克龙曾指出，欧美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与政治价值观，欧美同盟是价值观同盟。跨大西洋之间经济往来频繁，而贸易投资必须在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情况下才能深度发展。

但同时，欧美同盟当前也面临一系列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对美国安全依赖的下降。虽然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重新将第一要务从反恐转向集体防御（Collective defense），但此时的集体防御与 1949 年不同。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Pivot to Asia）后，美国的战略中心早已不在欧洲，这是北约和欧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加剧了欧美关系的紧张态势。他公开用过“敌人”这个词形容欧盟。所有美国总统到欧洲参加北约会议都会例行对欧洲的安全做出保障，但特朗普并没有遵循这一惯例，这让马克龙、默克尔、图斯克等欧洲政要深感不安，为此提出欧洲的战略自主。拜登上台后，跨大西洋同盟有所恢复，他不断强调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巴黎协定》等问题上也与欧洲达成共识。

冯仲平指出，欧美关系的发展有三种可能趋势。其一，

战略重心日益疏离。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绕过欧洲谈判；通过 AUKUS 与澳大利亚、英国加强合作，也绕过欧盟。以上行为或许意味着美国已放弃了英国以外的欧洲，一门心思与亚洲盟国对抗中国。其二，因对抗中俄而重振联盟。拜登在今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声明，“China is our systemic challenge”。虽然马克龙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北约的地图里没有中国，因为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近来欧美在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及价值观外交上仍达成许多共识。其三，有合有分，随时随事而定，这是今后最可能的发展趋势。欧美在中国问题上合作广泛，欧洲会千方百计避免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若干年后这个态势也不会改变，因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已经不在欧洲，欧洲没有必要随美而舞。欧洲紧跟时代变化的能力很强。二战后欧洲遭受重创，但惊人地实现了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的考验在于后默克尔时代欧洲的领导人能否坚持务实道路。目前，只有马克龙等少数领导人还在提欧洲战略自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与布林肯会谈时也表示欧洲“要走自己的路”，但其他国家对此兴趣不大，危机感意识不强。

总之，在当前乱局之下，一个新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兴起了。中美博弈决定了双方都需要获得更多伙伴，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伙伴的支持。欧洲现在对中美之间发生的事情高度关注，中美欧的互动今后会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中美欧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身对世界格局就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的发言题

题为《欧洲的时代认知和战略选择》。他认为欧洲对当今时代的认知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生逢乱世。在2016年《全球外交和安全战略报告》中，欧盟认为世界将重新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全球秩序退化，多边主义、国际组织遭到破坏。但从中国角度来看，大变化、大改组的时代往往也蕴含着大机遇。其二，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是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修正主义”力量。“修正主义”不仅表现在物质实力上的挑战，更体现在话语权方面。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安克雷奇会谈中对美方说“不吃你这一套”，欧洲人反应很强烈。中国表示不会另起炉灶，因为中国是当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但又表示不吃这一套，这让欧洲人不解。可以肯定的是，中方构想的世界秩序与欧美主导下的国际规则肯定有所不同，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异与共同点，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以上认知基础上，欧洲怀有某种浓重的怀旧心态，同事也不断反省（Wake-up call）。2016年以来，欧盟对新格局下的战略转变不断进行讨论，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战略建议，甚至有些“战略过度”。总的来看，欧洲在战略选择时，面临以下五种约束：其一，强烈的路径依赖。欧洲坚持要做领先的国际秩序制定者，保持规范性力量。其二，实力局限。欧洲在硬实力上已无法构成一极，因此它仍会重视在软实力、经贸方面的实力，强化对其的路径依赖。其三，资源约束。北溪二号的建设鲜明体现出资源约束对其战略选择的限制。最近欧洲的能源荒也是重要的现实案例。其四，空间制约。中美博弈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大国关系的主轴，欧洲的战略选择必然受制其中。最近，德国护卫舰巴伐利亚号来南海

巡航，同时提出访问上海，不希望得罪中美两边，但结果两边都不买账。AUKUS 是英国打破空间制约的努力，在局部问题上倒向美国，但在长期战略博弈中会尽量保持中美间的平衡。英国的做法值得长期观察。其五，动力问题。欧盟感受到了压力，但战略转型的动力不足。欧盟尚未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各成员国对局势的判断不同。欧洲要保持战略自主，就要加强欧洲层面的整合，但成员国认为这将构成对各成员国主权的侵害，在这方面存在非常强烈的悖论。

总之，欧洲仍然处于战略选择试错和形成的过程中。短期来看，欧洲的短板暴露无遗，但长期来看，欧洲正在尝试解决其内部问题，制定新的战略方针。近期在与法国智库交流时，他们认为欧洲在全球秩序的大变局中首先要保护自身，即“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欧洲“高筑墙”的趋势非常明显，“深挖洞、广积粮”存在能力问题，且并没有“缓称王”，而是急着加入大国竞争的行列。在当前形势下，欧洲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国际秩序和格局变化就是乱世和治世交替的过程，现在不幸的是处于乱世，期待这一轮大国竞争后仍会回到一个治世，要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欧洲现在正在形成的战略选择及未来能够发挥战略作用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陈新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下的欧盟对外经贸战略调整》，涉及全球贸易变局给欧盟经贸政策带来的挑战及欧盟应对挑战的措施两个方面。

陈新指出，全球贸易变局给欧盟带来的挑战有三点。其一，经贸领域是目前欧洲最强势的领域，但欧洲已不再是多

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美国在战后受益于多边主义贸易框架，但上世纪 70 年代后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90 年代后，美国的兴趣已经从多边转向了双边，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从双边转向了单边，深刻冲击了美国倡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与此同时，欧洲也得益于战后多边主义贸易体系。欧洲一体化的起步便是通过建设共同的关税区以消除内部的关税壁垒，并随着内部统一市场建设逐步产生外溢效应。通过共同市场的建设，欧盟得以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力量。然而，欧洲的立场现在也发生了转变。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后，欧洲从积极倡导一系列多边贸易谈判转向多边与双边并举，推动一系列区域性自贸谈判及双边自贸的谈判。中国长期受益于多边体系下国际贸易的扩展，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了国内经济的腾飞。但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逆全球化势头，美国与欧洲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下降，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新冠疫情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趋势，将带动产业链进行新一轮周期的调整。

其二，在产业政策领域，欧洲指责中国对企业进行补贴，扭曲了市场竞争。但实际上，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欧洲各国争相打造本国龙头企业，通过补贴或国家扶持的方式做大企业。石油危机后，大规模补贴的措施才逐步取消。最近，欧美似乎又回到采用干预性产业政策的路子上，美国提出的《创新国际法案》将带动相关领域的巨额投资，欧盟 7500 亿经济复苏计划也将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维持疫情下企业的运作，推动绿色经济及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三，贸易政策内涵的扩大。服务贸易比重增大，价值

观也纳入到贸易政策范围之内。2015年欧盟委员会曾进行了贸易政策的评估，主要涉及产业层面和地缘层面，具体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数字革命，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 TTIP 的谈判。2021年贸易政策的评估从结构看上主要包括全球化、技术发展、数字转型等，加入了气候变化的内容，最大的变化是新兴国家的崛起部分直截了当指出是中国的崛起。

陈新指出，一系列挑战促成了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其一，按照2021年《欧盟贸易政策评估报告》的计划，核心措施是“采取开放式的战略自治”，包括弹性和竞争力、可持续并公平、进取并基于规则的合作三个方面。其二，欧盟对其政策工具箱进行调整。2017年-2018年起，欧盟已开始了“三步走”：第一步为调整贸易政策，修改《反倾销法》，组织某些国家规避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第二步为调整投资政策，迅速制定并实施了《外国投资审查条例》；第三步为调整涉及欧洲一体化核心的竞争政策，譬如针对外国政府补贴实施立法。其三，增加新的政策工具箱。在供应链相关立法方面，一些成员国起步较早，如德国正在审议中的《可持续供应链法》。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也已开始就《供应链法案》进行讨论，核心在于只要涉及到与价值观有关的劳工、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企业就不得进入欧盟的供应链，旨在回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其四，在地缘政治中谋势，如成立旨在共同应对来自中国“战略挑战”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以及提出欧盟印太战略构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侨玲发言的题目是《中欧关系

中的变与不变》。她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抗疫成果表现出空前的敌对情绪，肆意抹黑中国。去年12月《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功后，在欧洲政界、商界包括社会影响都非常大。然而今年3月初，欧洲议会又因所谓的新疆棉与人权问题制裁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许多西欧国家建交以来，中欧关系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也并非一帆风顺。疫情以来一些欧洲国家的表现说到底意识形态在作祟，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

默克尔曾说，“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偏向美国，但在经贸上偏向中国。欧盟不会真正‘选边站队’”。疫情之下欧洲在意识形态上追随美国，但在经贸方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如果这一特性不发生变化，未来中欧关系虽然面临困难，但也不会偏离正轨。

吴侨玲认为，中欧经贸关系的维持反映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彼此需要。互利共赢是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中欧经贸关系的互补性极强。欧盟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近十多年来欧盟自身也进入多事之秋，接连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问题。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是欧洲企业重要的市场，对欧洲经济发展及欧洲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中欧政治关系中过去遇到的问题，将来一样也会遇到。前任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将中国视为“制度对手”，虽然不认同他的说法，但理解他的心态。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经贸领域合作将长期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曲兵的发言题目是《解析英国对华政策中的“蛋糕主义”思维》。蛋糕主义的英文为 Cakeism，源于 16 世纪英国的一句谚语“you canno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译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鲍里斯·约翰逊任英国外交大臣时称英国脱欧可以“have our cake and eat it”，即英国脱欧之后还能够享有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各种好处和待遇，同时又可以避免因为留欧而引发的各种后果。“蛋糕主义”在英国对华政策中表现为：一方面在价值观等方面坚持对华强硬立场，一方面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政府做生意。英国在 2021 年 3 月份发布《安全、防务、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审查——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报告，将中国定义为英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威胁，但同时也称中国是一个制度性竞争者。

曲兵指出，英国对华政策采取“蛋糕主义”思维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昔日英国作为大国的外交惯性使然，体现了英国的自信甚至是自负。英国曾经是一个纵横四海的全球超级大国，自诩外交手法高超老道。外交上的娴熟增强了英国的自信心，以至于英国在实力衰落后还相信可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其二，英国人认为自己手里有经济筹码。英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伦敦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英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借力伦敦，中国因此有求于英国。其三，涉及历史经验问题。2012 年 5 月，时任首相卡梅伦和他的副手克莱格在伦敦见了达赖之后，中英政治关系有一年多时间处于低谷，但当时双方的经贸合作仍保持热度，势头不错，这使得后来英国政治人物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双轨

并行的。

曲兵认为英国对华的双轨外交是走不通的。第一，双轨外交以实力为后盾，单纯靠投机取巧很难成功。英国实力衰退，脱欧后又缺少欧盟为其撑腰，对外谈判能力下降。第二，约翰逊政府有意分割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试图“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可惜这种英式的分割没有办法让中国接受，因为英国的很多做法一再触碰中国底线。可以看到，今年中英政治关系急转直下并直接影响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第三，中国现在逐渐认识到价值观问题、国家安全问题、贸易等要素是相互交织的，彼此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实践中很难拆分开来处理。第四，英国国内对双轨外交有很强的反对声音，认为约翰逊本人对华软弱，英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华政策不连贯、不清晰。比如今年5月时任国际贸易大臣，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在议会下院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言时，称英国在贸易问题上长期以来对华软弱，围绕未来的全球贸易，西方民主国家正身处一场同中国的较量中。今年9月初英国议会上院又发布一份报告，认为英国政府没有对华战略，现有的对华政策缺乏清晰的立场，在报告所谓的对策建议中，要求英国政府坚持人权和劳工保护等等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观置于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第五，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日本对英国的拉拢。

最后，曲兵分析了英国对华政策采取“蛋糕主义”思维的前景。首先，约翰逊政府目前不愿放弃“蛋糕主义”，因为“蛋糕主义”为英国保持了一定的战略选择空间，保证英国利益最大化。英国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中国，约翰逊提出的

“全球英国”愿景，主张深化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中国在未来十年对全球增长做的贡献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中英双方都能从双边贸易和投资中获益。在气候议题上，英国也需要与中国保持紧密合作。英国保守党前领导霍华德有一个说法，英国如果不与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建立联系并找到共同点，就不可能达成名副其实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其次，在“蛋糕主义”之外，英国尝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抱团取暖，打造不同的朋友圈。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在10月保守党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提出英国要构建自由网络，他指出“希望我们的盟友都知道，英国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对抗我们的对手，推动自由事业的发展”。

曲兵认为，“蛋糕主义”思维有英国特色，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同中国打交道时体现出的共同心理特征。欧盟对中国现在是一种多重的定位，包括合作伙伴、谈判对象、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界定。这就意味着欧盟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也会在这几者之间游走，既强调中国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因此未来中欧之间可能会有摩擦和矛盾，但合作的空间也是有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费海汀的发言题目为《中东欧政治寡头化问题研究》。他指出，谈到欧洲研究就绕不开俄罗斯，俄罗斯似乎成了欧洲的阴影或者鬼魂，是一个不在场的主角。欧洲既不接纳它，但又不能避开它，而且这种不能避开，不仅仅表现为地缘政治，在政治理论和制度上也很难避开。很多中东欧国家民主转型开始是向西欧制度靠，但多年后却越来越向前苏联或俄罗斯的方向靠拢。

俄罗斯政党政治经过转型后出现了独特的“政权党”现象，即政党依附于行政首脑，由行政首脑向其提供庇护，调动行政资源扶持该政党的成长。中东欧的情况与俄罗斯不同，这些国家中没有可以依附的强大行政首脑。然而，通过观察发现，这些国家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权轮替，但仍存在很多潜在的“政权党”，这一现象暂时可以被描述为“政党寡头化”现象。“政党寡头化”指政党依附于个人、家族或者一个非常小范围的精英群体，它不能形成政党意志，不能节制政治精英，政党纲领是虚无化的、抽象化的，并且这样的在野党一旦上台后会迅速启动国家化进程，迅速对整个行政机关形成控制。

政党寡头化有以下四种具体表现。第一，政党兴衰周期短于政治精英的生命周期。政党本身由政治精英所创立并用于选举。如果选举不顺利，政治精英可能亲手解散或重组政党，以新的面目在下次选举中卷土重来。第二，政党生命周期短于或者等于选举周期。政党不是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而完全是政治精英竞选的工具。第三，政治精英借助政党上台后迅速启动“政党国家化”进程，利用政党、修宪等工具对行政机关进行控制。第四，可能存在体制外强人+财富集团组建政党的现象。格鲁吉亚伊万尼什维利、捷克的巴比什等都是典型代表。

上述现象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精英和组织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认为，政党中应该是组织对精英形成约束，但在苏联式的政党中，频繁发生的是精英改变组织，组织规则、组织程序没有办法对精英实行约束。比如为什么

强大的苏共无法阻止戈尔巴乔夫方向不对的改革，没有办法约束他？为什么精英的转变会带来政党立场与性质的转变？

费海汀表示，他选取了几个模型试图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一个是“蝇王默认多元主义”模型，即在多方直接进行的政治竞争中若没有一方足够强，则所有人只能接受一个比较公平的规则，因此倒向多元的民主制度；另一个是“山中之王”模型，即体制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体制外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四方只有在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都占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相对稳定的改革。利用第一个模型，可以看到即使存在足够强的政治精英，也不可能单纯凭借超凡魅力持续不断赢得选举，也需要精英集团的接受与支持。利用第二个模型，可以看到精英集团本身也需要推举出政治精英个体作为代表参与选举和竞争，而精英赢取支持的能力本身就是精英集团重要的政治资本。

政党寡头化的案例分析：费海汀共选择了五个案例。首先是正面案例。匈牙利和波兰最符合上述理论模型，但这两国恰恰是转型初期的模范国家，目前都出现了逆民主化现象。匈牙利政党主要是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波兰则是法律与正义党。匈牙利政治精英是欧尔班，在波兰则是卡钦斯基兄弟。匈牙利的选举民主建设没有完全成功，支持维持现状或者缓慢改革的体制内精英作为“山中之王”力量占优，转型整体开始向腐败与个人统治方向发展，波兰呈现同样的轨迹。其次是捷克，与匈牙利和波兰略有不同，捷克总理巴比什是体制外的精英+首富组建的集团代表。捷克的案例反复证明，

即使是原先支持民主化进程的温和派，一旦成为执政者后也完全转变为抑制民主化进程的强硬派。因此，前述的两种理论模型实际上高估了体制外反对派的作用，同时也能够证明转型不能完全简单等同于选举民主的建立等具体形式，而应将其视作一个各方反复博弈直至局势趋于稳定，各方最终接受并不会试图挑战当前规则的长期过程。第三是负面案例，乌克兰存在季莫申科、库奇马、亚努科维奇的三分竞争，但没有建立“蝇王默认多元主义”中预设的公平竞争原则，政党出现了严重的寡头化。相反，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是政治强人，但他主动放弃了威权统治。斯洛伐克的民主联盟对梅恰尔发起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斯洛伐克的政党寡头化现象不明显。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费海汀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党寡头化的确可能是民主解构或民主倒退的重要解释因素，民主化的阻滞和逆转常常是由于政党本身组织规则的退化与削弱造成的。寡头化的政党可能赋予政治精英更强动机以改变和颠覆竞争规则，这个概念解释了乌克兰为什么没有走向“蝇王默认多元主义”。第二，政党的寡头化可能出现在于转型的任何一个阶段。寡头化对政党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也是饮鸩解渴的行为。他认为，中东欧国家的逆民主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忽视了政党内部的建设，缺乏完善的组织程序，以及明确的政党纲领和严密的党规所导致的结果。

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徐晓红的发言主题是《英国权力下放与苏格兰分离主义：现状与未来》。她指出，自苏格兰民族

党发展壮大以来，关于苏格兰独立的问题长期在英国政府的议题中占有一席之地。2015年的独立公投原本已将这一问题划上句号，但英国脱欧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上了议程。

苏格兰谋求独立的合法性有两个论证角度：认同归属和现实考量。从认同归属看，首先，苏格兰对历史上英格兰霸权不满的记忆，叠加苏格兰主张的留欧与英格兰主张的脱欧之间的矛盾。其次，苏格兰和英国其他部分传统纽带的弱化。新教作为英国国家黏合剂的作用弱化。二战以后伴随帝国的解体，苏格兰与英格兰因帝国霸业而形成的共同荣誉感也逐渐弱化消失。第三，苏格兰民族特性和地方自治传统的保持。苏格兰保留了独特的宗教组织、教义体系和法律制度，并通过教育实现了代际传承。第四，苏格兰和欧洲大陆历史制度文化的亲缘性。苏格兰曾多次作为法国盟友抵抗英格兰，苏格兰的法律体系受罗马法影响深远，大体上属于大陆法系。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学术交流频繁，最早建立起的几所大学都有欧洲大陆国家的背景。第五，苏格兰对于欧盟的认同。从现实考虑看，首先是必要性，捍卫苏格兰提出的“多元民主”理念，苏格兰民族党将支持苏格兰独立作为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保障苏格兰的经济利益，譬如北海油田的利益，保障欧盟为苏格兰提供的农业补贴、区域发展支持等。第二是可能性，脱英派的支持者呈扩大趋势。对鲍里斯领导的保守党和脱欧不满的人正转向支持独立。2016年支持民族党的选民中支持脱欧派比留欧派的比例高6%，最近的调查显示二者的支持率分别为57%和39%。在2021年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支持独立的民族党获得64席，绿党获得了8席，

超过了半数。相关独立议案在议会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

徐晓红表示，英国脱欧对苏格兰独立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激发了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是为独立阵营提供了现实案例教训。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脱欧民主赤字问题。苏格兰独立之所以被重新提上议程，是因为英国脱欧时有 32% 的苏格兰投票者选择留下，此后独立就被苏格兰民族党频繁提起。二是保守党和首相鲍里斯的个人形象日趋下降。2019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信任苏格兰政府可以按照苏格兰利益行事的受访者占 61%，而信任中央政府的只有 15%。斯特金稳健的领导风格倍受赞誉，特别是在疫情中的表现和鲍里斯形成鲜明对比。三是苏格兰人意识到欧盟统一市场对自己的重要性。

英国脱欧也为苏格兰的独立阵营提供了案例教训。首先，不要轻易从一个运行良好的联盟当中退出。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联合已有 314 年，双方共享政治架构、公共空间，长时间共享议会、新闻媒体系统、商业环境甚至政党系统等，双方如果分割，肯定比英国脱欧更艰难。其次，独立就意味着失去原有联盟提供的支持和保护。英国脱欧虽然争回了对边界主权的一些控制，但失去了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影响欧盟政策的机会。苏格兰如果独立，也将失去英国国内统一市场以及既有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保护。第三，英国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关于脱欧后的明确计划，这也给苏格兰独立阵营提了醒。

徐晓红认为，苏格兰谋求独立仍面临着诸多显示困难和障碍。一是目前疫情的发展使得抗击疫情仍是各方首先要考

虑的事。二是法律程序的合法性要求。苏格兰独立需要伦敦批准，因为伦敦保留了宪法事务的立法权。三是独立后会面临的实际障碍，比如退出英国的相关条款，边界划定，以及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构建工作。四是在加入欧盟以及获得国际承认方面存在较大难度。综上所述，苏格兰和英国中央政府都面临着双重权衡。苏格兰不会硬独立，中央政府也不会硬阻止，双方需要在苏格兰民众认同构建和想象构建中争夺领地。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翟晗的发言题目是《对联盟说“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的“宪法特质”教义及其历史制度意涵》。她表示，新世纪以来，英文比较宪法学界出现了宪法学和政治学重新会首的趋势，其中欧盟公法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去年疫情时，欧盟推出了“新冠债券”以恢复生产，但德国宪法法院坚决反对，认为欧盟的一揽子财税计划将重构联邦制财税的刚性结构，构成了欧盟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今年8月，波兰宪法法院法官又与欧盟法院发生激烈对抗。原因是波兰成立了法官纪律委员会，要求主审法官在处理大案要案时必须获得纪律委员会的裁判建议，这实际暗含着司法权威应服从政治领袖之意。欧洲法院认为该委员会违背了欧盟法对于法治和民主制度的要求。最后波兰不得已临时冻结了纪律委员会对于案件的审查权三个月。

翟晗指出，以上案例体现了欧洲公法框架与各国宪法主权的冲突。欧盟的公法框架指欧盟层面相关的权力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及欧洲议会，对于成员国民主法

治进程进行监督。在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欧盟成员国的宪法法院在很多领域都在尝试挑战欧盟层面的政治权威。目前看，欧盟法并未突破成员国国家层面，进而对成员国内部的个人或者自主体产生直接效应。

在欧盟宪法条约失败后，如何把握欧洲公法结构及宪法观念？学术界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威权回潮。实际上，二战后宪法法院本身作为政治机关开始兴起，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制认为自身缺少防卫机制，有必要加强保护机制的建设，最主要的考虑，就是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判解散极端政党。当宪法观念进入欧盟层次后，宪法特制教义对欧盟公法现实处境意味着什么？它指向的是公法框架中的何种权力结构和张力？实际上《里斯本条约》就是失败的欧洲宪法条约的简化版。《里斯本条约》本来认为可以在德国获得通过，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使用正立的法律原则否定《里斯本条约》，认为德国一旦签署，就相当于在联邦制上再设立一个联邦制，从而破坏了德国联邦基本法。实际上在上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共同体早期，各成员国和共同体之间的博弈大多在政治层面，但 60 年代之后，成员国对于所谓共同体层面政治权威的挑战，基本上都被纳入到公法层面的互动中。因此，即便是做欧洲政治研究，也要重视公法结构与各国宪法之间的关系，这对与研究欧洲是很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磊的发言题目是《欧洲议会与中欧关系》，主要内容包括本届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以及中欧关系的前景与展望。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新一届欧洲议会将在中欧关

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以下特点。第一，本届欧洲议会虽然通过了一些有助于促进中欧关系的决议，譬如《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欧民用航空安全协定》，但大量决议仍涉及中欧关系中比较敏感的如涉疆、涉港、涉台问题。第二，本届欧洲议会更加看重人权因素，将人权与经贸关系挂钩。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欧洲议会要求考虑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各种中国人权状况。今年3月欧洲议会威胁中方若不解除对部分议员的制裁，欧洲议会将拒绝执行《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过程，甚至建议欧盟及成员国领导人和官员抵制北京冬奥会。第三，本届欧洲议会更加积极主动要求欧盟委员会提出一些限制中国的提案，比如提出制定《供应链法》，加强对军民两用产品和网络监控工具等技术的出口管制等。第四，议会中的主要党团在中欧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有一些共识，强调欧盟在价值观问题上不能对华妥协。今年3月，欧洲人民党通过一份对华立场文件，提出中欧存在合作、竞争、对抗三种关系，在务实接触时不应在价值观上对华妥协，这体现了大多数议员的立场。

张磊认为，本届欧洲议会对华强硬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欧洲议会党团格局趋向碎片化，很多边缘性小党进入欧洲议会。自由民主党党团和绿党党团地位提升，使得欧洲议会的立法立场向左偏移，朝着规范化、注重价值观方向发展。其次，自信的议会主义得到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议会是扩权道路上走得最快的欧洲机构。一方面它能够行使和欧盟条约及各种规则相关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利用各种有利于自身的不成文规则达到立法目的。此外，本届欧洲议

会作为批评者的身份更加突显，不仅批评欧盟其他机构，对第三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也积极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第三，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等机构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加突显出其人权卫士的身份。与此同时，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下属智库在疫情期间的一项调研显示，部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趋于负面。第四，美国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美进一步加紧协调对华立场，在美国推动下欧洲议会支持制裁中国。

张磊最后对中欧关系的前景进行展望。第一，中欧关系未来不确定性将增强，对抗和冲突无法避免。下一届欧洲议会选举的碎片化程度会更加明显，绿党等一些中左翼政党重新掌权，中欧关系将趋于紧张。欧洲议会权能扩张的道路不会停止。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国会的立场和举动也会促使欧洲议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二，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基本判断是欧洲议会将给谈判带来负面影响，短期内协定将处于搁置状态，长期看也不排除被否决的可能。即使能够通过，欧洲议会在谈判过程中也会不断制造杂音。最后，不可忽视欧洲议会内部的对华友好力量，中方应更加积极地与他们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梁雪村的发言题目是《一体化的理论反思：欧盟为什么需要民族国家？》。他指出，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112票，虽不占多数，但在英、法、意、波四个大国中有效瓦解了亲欧选民的基础。美国和欧洲政治共振也使得在政

治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民族国家的再关注更为迫切。

梁雪村表示，关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阻碍，现有文献提供了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潮两种解释。但事实上，经济下行压力既有可能瓦解共识，也有可能促成一体化发展。上世纪40年代的煤钢联营便是在危机中诞生的。政治思潮的解释则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发生的原因，为何欧盟一体化70年后民族主义势力仍然强大。长期以来，一体化理论和民族国家的关系给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理论预期，即伴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民族国家将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被完全替代。相互依赖的增加促使民族国家让渡部分主权，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回顾欧洲历史，可以发现关于一体化一直存在两种愿景。其一，是世界主义的欧洲，在18、19世纪具体表现为欧洲军事协调，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欧洲国家以整个欧洲的名义对外发布相关声明，就是他们认为当时世界主义欧洲的概念已经存在。近来，秉持世界主义的精英阶层力量在欧洲不断壮大，这些跨国资本精英、技术精英认为不再需要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快速消失。其二，结合苏格兰独立、东欧威权回潮等现象，可以发现欧洲内部存在着对民族国家认知的断裂。即便在那些非常避讳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发动机”国家，他们也时不时被迫或无奈地面对“姓法还是姓德”的问题。2018年，兴业银行遭受严重财务危机，希望寻求资本购买或进行战略投资，对此法国总理称，兴业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继续作为一家法国银行存在，买家只接受法国公司。

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成员国将形式上的主权让渡给欧

盟是为了在面对来自新兴市场竞争时保留事实上的主权，以更好地应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因此，从辩证意义上看，法律层面的主权有所减少，但事实主权有所增强。梁雪村认为，或许不能再用功能主义的视角理解欧盟。1943年米特兰尼在《有效和平体系》中指出，欧洲的联合不应向联邦主义者那样企图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应主动在与成员国的互动中保持边界感。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米特兰尼写作此书时，强调的也是一体化产生的和平效益，而并非将欧洲整合为一个国家。福利国家的发展实际上也隐含民族国家的因素，因为福利国家必须依托于一个共同体，而目前国家而非欧盟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福利国家必须有边界，福利主义不可能无限扩大。

但另一方面，欧盟也需要民族国家。首先，民族国家发挥了均质化和政治团结的功能。正如福利国家需要边界一样，民主制度也需要边界。民主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才造就了今天欧洲各国的社会。其次，目前在欧洲的社会理论层面上替代民族主义的是多元文化主义。但从现实来看，移民的融合问题并没有获得实际上的解决。卡梅伦在2011年的讲话中说“我们鼓励不同文化各自为战、彼此孤立，也孤立于主流社会，我们甚至容忍这些处于隔离状态的社群以完全违背我们价值的方式运行，结果产生一大堆双重标准”。因此，各国仍需要民族主义以凝聚国内共识。总之，良性民主的存在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假定他人是普遍的善。在一个分裂的、疏离的甚至仇恨的混杂人群当中，他人的善被瓦解或是遭受破坏，于是便不能产生良性民主。因此，民族国家为

欧洲各国的国内民主提供了保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段德敏的发言题目是《欧洲一体化中的民主赤字与认同》。他表示，欧洲如何认识一体化的内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关于民主、认同、分配、正义的问题非常重要，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

密尔在《代议制民主》里面专门有一章写民族认同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如果这个国家由两种认同完全不同的人构成，那民主肯定不可能的。段德敏认为，如果将这样的问题放在欧洲共同体层面，就是要讨论欧洲不同的认同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欧洲层面的认同。

欧洲国家基本都认为需要加强欧盟层面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和原有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认同肯定不是同一种性质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建立欧洲共同体，实际上是吸取了原有民族国家的教训，他们认为人类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和民族国家很强的民族认同有关，因为民族是具有排他性的。欧盟的认同不能是排他性的认同，不能在树立目标敌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看来，高强度的民族认同是负面的、过时的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所谓“宪法爱国主义”，即欧洲的认同应是对一套法律体系或者权利体系的认同，应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他的理论有许多空想的成分，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近十几年来，欧盟从一个包容的共同体正逐渐走向保守，难民危机激发了各种右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势力。

段德敏认为，目前欧洲的民主赤字现象愈发明显。此处

对民主的界定比较宽泛，可以理解为：决定由谁做出？是不是我们自己人做出？是不是为我们而做？很多人指责布鲁塞尔做出重要决定时没有与成员国充分讨论，成员国的利益没有被充分代表。实际上，民主赤字的问题在欧洲由来已久，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如影随形。肯特大学米拉姆·索拉斯列出了欧盟民主赤字的六个要素，包括制度层面上的机构设置模糊、立法和政策制度过程的“去议会化”、欧洲议会议员影响力不足等，也包括更为根本的认同问题，即没有“欧洲人民”便不会有“欧洲民主”。实际上，制度层面和认同层面的问题是相互矛盾的，欧盟制度的影响力越强，民主赤字的程度就越高，因为当前很多欧盟机构的代表性不强，对于欧盟的认同也不高。

自从民主赤字问题提出以来，欧盟一直持续不断增加改革力度，但对民主赤字的指控不降反升。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就是某种多数决的原则，而实行多数决的原则需要某种认同，需要对共同规则的认可。欧盟既非一个民主国家，又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组织。对照美国的发展历程，美国建立联邦制时已经存在非常高的国家认同，这一认同是在长期的殖民地历史及对抗英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欧盟层面却没有形成类似的认同。在德国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判决”中，一个德国人控告德国政府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侵犯了德国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在没有征求德国人民的意愿下将许多主权让渡给其他机构。德国宪法法院认为，这个条约本身是不违宪的，如果判定违宪，德国以后就不大可能加入其他类型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并不违宪”的判决结果并不出人

意料，但由一国宪法法院决定政府的行为是否违宪本身就体现了目前欧洲层面的民主尚未形成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单一的“欧洲人民”出现的情况下，欧盟层面的民主才可能具有真实性。换言之，没有“欧洲人民”，就没有欧盟民主，民主赤字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

索拉斯的理论遭到了许多批评，主流的意见认为，这一观点过于陈旧，它其实是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模式套用在了欧盟之上，似乎欧洲只有变成一个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整合，从而才能真正建设民主。哈贝马斯认为，不需要高强度的人民认同，欧洲层面的民主也可以实现，但他提出的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也同样经不住现实考验。因此，欧洲民主赤字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根源在于欧盟层面整体认同的缺失。集体认同扩张时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欧盟试图推广的现代民主价值不符，因此欧盟试图突破民主赤字的努力正陷入结构性的困境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吕晓宇的发言题目是《以区域作为方法的欧洲危机》。他认为，以区域作为方法意味着不仅仅要关注国家内部的政治运行机制，还需要关注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把欧盟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分析。

欧盟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被视为是现代区域化的典范，是应对全球化的有效方法。但它为什么会在目前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以英国脱欧为例，英国历任首相的发言都指出，脱欧是一个建设更加现代化的英国的时机。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如何还能继续作为应对全球危机的有效方法？从当前欧洲的各种政治运动可以发现，欧盟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批

评：过于保护主义或过于自由化。这两个方面和对全球化的支持或反对态度有关。

欧盟当前同样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挑战来自治理层面，即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如何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另一个挑战来自规范层面，即欧盟作为区域内的规范的制定者，如何能够在新形势下对规范作出调整，以应对挑战。如何解决欧盟面临的危机的基本点在于：欧盟从前是如何处理危机的，以及欧盟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何处。欧盟尝试走出民族国家的框架，这需要重新审视“民主”的原则。但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从 2010 年开始，欧洲和中国都同样面临政治上的挑战，这形成了一种交会。二者都需要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探索危机的出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Luís Cordeiro Rodrigues 的发言题目是 *European Capuchin Missionaries,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Decolonization of Philosophy of Religion*。他认为，欧洲神学概念中的“善”和“恶”并不仅仅是关于上帝的心灵与意志的形而上学的讨论，恰恰相反，这种概念在有些时候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从而在基督教、白人、其他宗教和种族之间建构起一种等级秩序。这种功能的影响之一就是将被非洲黑人女性描绘成一种白人可以想象的邪恶形象。

这种宗教建构为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等行为正名。比如，在 17、18 世纪的安哥拉地区，欧洲圣方济各会传教士扭曲了基督教神学教义，运用“恶”的概念将非洲女性污名化，将安哥拉抵抗葡萄牙殖民和奴隶贸易的运动领袖、民族英雄

纳辛格描绘成一个食人魔的邪恶形象，从而为葡萄牙在此地区的殖民进行辩护。

欧洲当前的一些种族、宗教偏见以及对某些群体的歧视也和此类宗教观有联系。对黑人的歧视是当前种种歧视的观念基础。在这种观念中，不同的宗教和种族会被“理性主义”的标准衡量，从而被至于一个价值的尺度之上，从而具有高下之分。而更高级的宗教、种族需要将低级的宗教、种族文明化。可见在当今，欧洲的宗教哲学的一部分遗产需要被去殖民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Enrico Fardella 的发言题目是 *Italy's new centrality in the EU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nd its impact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他从意大利外交关系的变动分析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自二战以来，意大利的外交一直保持着“两个锚点，一个基准线”，即欧盟、北约，以及地中海地区。2015-2019 年对中国的开放部分改变了其传统的盟友关系，但由于其包含的反美、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倾向而饱受批评。2021 年德拉吉的上台则标志着意大利外交政策的转向和右翼民粹势力的退却。

德拉吉本人有长期任职意大利和欧洲央行行长的经历，并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而英国脱欧、默克尔卸任都为德拉吉个人提升在欧盟中的地位和声望提供了很好契机。意大利在欧盟新冠救济基金中具有一定的有利地位，如果德拉吉通过这个基金推行有效改革，则很有可能会巩固意大利的国际地位，并对欧盟和其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竞争产生积极影响。

德拉吉上台后重新调整了意大利的外交战略，提升了意大利在欧盟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他重视欧盟和北约的作用，加强了和法国、德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在美国越加倾向单边行动（撤军阿富汗、组建 AUKUS）的背景下，意大利和法、德近期的一系列外交互动反映了欧盟团结的增强。德拉吉政府的外交行动对跨大西洋关系和欧盟具有深刻影响，也会使中欧关系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讨论环节，与会者就“蛋糕主义”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崔洪建：所谓“蛋糕主义”的逻辑是政经切割，按照不同逻辑和你打交道。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中欧之间可以谈竞争，但是竞争是服从于合作的，只能在合作基础上谈竞争，只能在共识基础上谈分歧。但是国际关系是互动的，如果我们始终不接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最终双方要在共同接受的行为模式下相处，关系创新方面的压力在我们这，要打出比他们高明的牌。

李强：我们国家的态度是不能把经济贸易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蛋糕主义”的。在面对贸易制裁时，我们对大部分国家是针尖对麦芒的，惟有对英国有些例外。英国对华经贸制裁是比较多的，但我们对英国的制裁相对较少。说明中央考虑英国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但它在“五眼国家”中仍能发挥重要的智库作用。英国在外交方面是有深谋远虑的，我们不应总认为英国所有的事都是美国压着，实际上有的事是英国在影响着美国。

冯仲平：“蛋糕主义”是一种很形象的学理上的分析，实际上英国在中美之间互相选择，我认为它离开欧洲以后心

理上觉得空荡荡，它离开一个组织后有一个真空期。拜登和约翰逊是两类人，拜登公开说过我怎么看你都像特朗普，所以捏着鼻子和约翰逊谈话。从长时段来看，英国不是说一定要倒向美国，英国离开了欧盟但离不开欧洲。我们和欧洲以及美国该合作还得合作。